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973082、71203146、71273179）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2-101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 测度及其决定机制

——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耦合的视角

张广胜 周密 著

A Measure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Determinants:

A Perspective on the Coupling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013060135

D422.6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0973082、71203146、7273179）资助 19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2-1014）资助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 测度及其决定机制

——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耦合的视角

张广胜 周密 著



D422.64

19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航

C166746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度及其决定机制：基于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耦合的视角/张广胜，周密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 - 7 - 5141 - 3464 - 3

I. ①新… II. ①张…②周… III. ①民工 - 城市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3265 号

责任编辑：李 雪

责任校对：隗立娜

责任印制：邱 天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度及其决定机制

——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耦合的视角

张广胜 周 密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37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 tmall. 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6.75 印张 250000 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3464 - 3 定价：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迫在眉睫。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分化，使得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占据农民工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的出路必然是在城市定居。那么，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不仅关系着我国的长治久安，也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和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本书着重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角度研究其市民化，即在目前的政策制度框架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分析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之前，对市民化程度进行测度是有必要的。本书首先提出了市民化程度的一种新的测度方法，它是从市民需求与市民供给的角度进行的。在测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后，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本书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研究准备。对应本书的第1章。该部分主要说明本书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对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后，提出本书的研究目标和主要的研究内容，同时对所用到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主要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概述。最后，界定了本书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研究的理论背景和政策背景。

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对应本书的第2章。该部分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静态和动态角度进行分析。从静态角度运用

一般均衡的基本理论，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它们之间的耦合对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促进市民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耦合程度越高，越会促进市民化程度的提高。从动态角度运用演化博弈的基本理论，分析了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博弈对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农民工的市民需求会促进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只有政府提供的市民供给数量大于农民工的市民需求数量，才会产生稳定的均衡。在目前城市政府市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增加市民需求和市民供给会促进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度。包括第3章、第4章、第5章和第6章。第3章对本书经验分析中运用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比较了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在自身特征、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差异。第4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需求，界定了市民需求的概念及其测度指标，并认为市民需求存在一个阈值，只有在阈值之上的劳动供给曲线才为市民需求曲线。该理论的经验分析表明，在阈值之下，收入对市民需求有显著的正影响，即新生代农民工在该阶段追寻着收入的最大化；而在阈值之上，收入对市民需求无显著的影响，即新生代农民工在该阶段追寻着效用的最大化。第5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供给，界定了市民供给的概念及其测度指标，分别从工作稳定性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较为稳定，不会轻易离职；而在城市工作时间的长短，会影响他们选择是否职业流动，但在城市的工作时间与职业流动次数的多少不呈正相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在城市的工作时间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第6章运用需求可识别的 biprobit 模

型测度了样本地区的市民化程度和市民抑制程度，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第四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对应本书的第7章。本章根据第6章得到的市民化程度和市民抑制程度，采用布兰德-欧萨卡（Blinder - Oaxaca）分解方法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了样本地区沈阳和余姚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和市民抑制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沈阳和余姚两地区的市民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Blinder - Oaxaca 分解发现，系数差异是导致两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在系数差异中职业阶层的差异可以基本解释全部的市民化程度差异。同样，两地区在市民抑制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Blinder - Oaxaca 分解发现，特征差异的贡献达到40%，本书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分解的方法，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贡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提高对降低市民抑制程度有正向的影响，而只有在市民抑制程度较高时，提高人力资本才会降低市民抑制程度。

第五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应本书的第8章。针对本书分析得到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新生代农民工微观管理对策。在户籍制度方面，应取消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福利分配制度，降低农民工落户门槛；在居住方面，鼓励用工单位自建宿舍，将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房享受范围；在人力资本培育方面：首先，加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其次，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最后，增强企业对农民工在职培训的积极性；在社会资本构建方面：首先，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契约型社会资本的构建；其次，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型社会资本的构建；最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自我投资。

作者

2013年4月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
1.1.2 研究意义	4
1.2 研究综述	5
1.2.1 城乡人口迁移及市民化	5
1.2.2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	12
1.2.3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概念及测度指标	15
1.2.4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市民化的影响	19
1.2.5 对已有文献的评述	21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22
1.3.1 研究目标	22
1.3.2 研究内容	22
1.4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分析框架	24
1.4.1 研究方法	24
1.4.2 数据来源	25
1.4.3 本书的分析框架	26
1.5 本书的创新点	26
1.6 概念界定、理论背景及政策沿革	28
1.6.1 基本概念界定	28
1.6.2 两阶段迁移理论	30

1.6.3	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政策	31
第2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回顾与借鉴	42
2.1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的静态分析：基于一般均衡理论	42
2.1.1	一般均衡理论的概述及基本原理	43
2.1.2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46
2.1.3	一般均衡模型	48
2.1.4	人力资本对市民化影响的分析	52
2.1.5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耦合对市民化的影响	53
2.2	政府政策与农民工市民化选择的动态分析：基于演化博弈理论	54
2.2.1	演化博弈原理简介	54
2.2.2	基本假设	55
2.2.3	复制动态及演化稳定策略	57
2.2.4	结果分析	59
2.2.5	数值分析	60
2.3	小结	62
第3章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63
3.1	自身特征	65
3.1.1	年龄	65
3.1.2	性别	66
3.1.3	婚姻状况	67
3.1.4	人力资本	68
3.1.5	社会资本	69
3.2	农村退出的比较研究	73
3.2.1	外出务工目的	73
3.2.2	与土地的关系	74

3.2.3 与家乡(流出地)的联系	75
3.3 城市进入的比较研究	76
3.3.1 工资收入	76
3.3.2 职业分布	76
3.3.3 进城务工的途径	79
3.4 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80
3.4.1 业余生活	80
3.4.2 自身认同	81
3.4.3 未来打算	83
3.4.4 城市感受	84
3.5 小结	85
第4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需求	86
4.1 市民需求的概念及测度	86
4.1.1 市民需求的概念及内涵	86
4.1.2 市民需求的测度	87
4.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需求与劳动供给	88
4.2.1 个体劳动力供给的经典模型	89
4.2.2 最低必需支出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理论借鉴	91
4.2.3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市民需求: 改进的劳动供给曲线	94
4.3 城市对农民工市民需求的拉力	98
4.3.1 理论模型的选择	98
4.3.2 计量模型结果及分析	99
4.4 农民工外出迁移对市民需求的推力	101
4.4.1 理论、模型与方法	104
4.4.2 数据	107
4.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109
4.4.4 结论	113

4.5 小结	114
第5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供给	115
5.1 市民供给的概念及指标构建	115
5.2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116
5.2.1 工作稳定性的测度	116
5.2.2 模型选择	117
5.2.3 变量选择	117
5.2.4 回归结果及分析	121
5.3 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决定及其影响因素	123
5.3.1 工资决定理论与假说	123
5.3.2 描述性分析	124
5.3.3 计量模型分析	126
5.4 农民工与市民工资决定的差异	128
5.4.1 概念界定及假说	130
5.4.2 数据来源及样本概况	131
5.4.3 计量模型分析	134
5.4.4 结论	141
5.5 小结	142
第6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度	143
6.1 Biprobit 模型简介	143
6.1.1 单变量 Probit 模型	145
6.1.2 局部可观察的双变量 Probit 模型	145
6.1.3 需求可识别的双变量 Probit 模型	146
6.2 模型选择	147
6.3 自变量的选择	148
6.3.1 市民需求的影响因素	148
6.3.2 市民供给的影响因素	149

6.3.3 识别变量的选择	150
6.4 计量模型分析	150
6.5 不同测度方法的比较	153
6.5.1 几何平均法	153
6.5.2 指标评价体系法	154
6.5.3 层次分析法	155
6.6 小结	159
第7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160
7.1 分位数回归及分解的原理简介	161
7.1.1 分位数回归方法	161
7.1.2 分位数回归的分解	162
7.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分位数回归	167
7.2.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描述性分析	167
7.2.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分位数回归	168
7.2.3 市民化程度差异的 Blinder - Oaxaca 分解	171
7.2.4 进一步的分析	173
7.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差异的分析	175
7.3.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的概念及测度	175
7.3.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的分位数回归	177
7.3.3 市民抑制程度差异的 Blinder - Oaxaca 分解	181
7.3.4 市民抑制程度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182
7.4 小结	185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含义	187
8.1 结论	187
8.2 政策含义	188
8.2.1 户籍制度改革	189
8.2.2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	190

8.2.3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培育机制问题	191
8.2.4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机制问题	193
8.3 研究展望	194
附录 1: 城市外来劳动力调查问卷	196
附录 2: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工市民化的 几份重要文件	210
参考文献	242
后记	256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民工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群体，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逐步融入城市。然而由于户籍制度及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工进入城市并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 2 亿人，其中，年龄在 16~30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的 61%，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正在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显然，作为城市未来的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将对我国的城乡就业和城市化发

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刘传江（2004）认为，人们对农民固有的认识偏见、政府的政策排斥、相关制度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共同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缓慢。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不高，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加快城市化发展是必然途径。据农业部调研组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上升到1978年的17.9%，年均仅上升了0.26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到2000年城市化率仅达到36.0%，进入21世纪，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国家统计局，2012）。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由30%提高到70%的阶段，即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在客观上会促使大量农民不断实现职业、地域和身份上的转换，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在现有的户籍制度框架下，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职业上是工人，在社会阶层上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而在社会身份上却仍属于农民。尽管他们实现了职业的迁移，空间迁移却没有同步实现，进而形成大量的暂时性定居和候鸟型打工的阶层。大量的农民工若长期停滞在农民工状态而未能市民化，不仅不利于城市新劳工群体的形成，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而且还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隐患乃至障碍因素，为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重要而现实课题（刘传江等，2010）。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增多，且与上一代农民工在特征上有显著差异。他们一直或长期生活在城市，类似于城市的“新移民群体”，其实质是“劳动力移民”（国外的学者一般称中国城市农民工为“劳动力移民”：他们居住在城市多年，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尽管没有城市户口）。在数量上，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人左右，如果将8445万人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

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 2.3 亿人职工中(2008 年为 2.25 亿人),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他们的平均年龄在 23 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时基本初中刚毕业,近 80% 的人未婚,他们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全国总工会,2011)。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他们的需要层次逐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寻找工作不仅注重工资待遇,更注重工作的待遇、福利等,“是否能开心工作或有体面的工作”成为他们寻找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条件。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他们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值得我们进行更细致地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离开户籍所在地进入城镇第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约为 8 000 万人;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估计,2002 年“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约为 9 460 万人。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其中加工制造业中 68% 的从业人员是农民工,建筑业、采掘业中近 80% 的从业人员也是农民工。他们主要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成为市民不愿从事工作的替补者。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农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离农村。尽管我国地大物博,但我国农村的劳均耕地面积不足 3 亩,若按照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匡算,一个有两个劳动力的四口之家要耕种 60~120 亩耕地才能挣到城镇中低水平的收入。若按此水平,我国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必须将其转移才能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外,农民工问题有两种解决途径:一是在城市定居下来,即实现身份上的市民化;二是回乡,即在身份上仍为农民。从个体上看,这两种情况均可能存在,但从总体上看第二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因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若农民工都退出城市,城市的发展必然受到重创。另外,从农民工自身角度考虑,他们也不能都回到农村,毕竟农业的比较收益是低下的,即便国家补助增加,农业收入仍较低。

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城市接纳了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并使他们享受市民的待遇，才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乃至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真正转变为市民。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的城市化，从而实现现代化。

总之，在我国目前二元城乡制度框架下，加快现代化必然需要提高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化进程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然而，农民工群体内部已发生异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强烈。因此，本书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从农民工自身的视角探讨是什么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1.1.2 研究意义

就理论意义而言，首先，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准确估计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如何，才能比较和判断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才能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他们市民化程度提高，而且，市民化程度要与工业化程度相匹配，且不可盲目市民化，不顾工业化进程，导致大量“农民”在城市聚集而被市民化；其次，在不同的市民化程度时，各因素的影响也是不一致的，即影响市民化程度的因素具有不同的“溢价水平”，如何采用合适方法进行测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最后，从供需两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市民化程度进行分析，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市民需求，或者宏观上的管理政策，其实农民工是否能转变为市民，不仅仅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市民意愿，更与中国各个城市的相关政策有关，如现在户籍制度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都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一个政策导向，因此，结合农民工自身的意愿与城市政府的管理政策，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更具有理论意义。

就现实意义而言，首先，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劳均耕地面积小，农村劳动力冗余，促进农民转离农村，进入城市，是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方式；其次，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对维护我国经济建设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大量农民工候鸟式定居在城市,不仅不利于他们安心在城市工作,更不利于农民工后代实现市民化,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最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使得他们的个人素质得到提高,有利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加快。

1.2

研究综述

1.2.1 城乡人口迁移及市民化

国内外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很多。从理论上的研究包括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分析迁移者个人或家庭的特征对迁移动机和迁移决策的微观迁移理论及对迁移的宏观流量进行分析的刘易斯—费—拉尼斯宏观迁移理论(王国辉,2006)。从实证上的研究主要包括迁移决策、迁移阻碍、迁移融合和迁移效果等几个方面。迁移决策的研究主要有人口迁移的地域、规模和方向性等研究(钱永坤,2006;白南生等,2002);迁移阻碍的研究主要有中国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方面(Haan,1999;Roberts,1997;Johnson,2003);迁移融合主要包括定居意愿、融和情况等(李强,2009;Zhao,1999;蔡昉,2010);迁移效果包括对迁出地社会经济的影响(白南生等,200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周密、张广胜,2010;Todaro,1984;Hare,1999)、对迁入地社会经济的影响(陆铭,2007;Simon,1992)以及对地区间经济效果的影响(世界银行,2006)。本书从迁移融合的角度研究市民化。衡量迁移融合程度的指标有很多,采用市民化程度来度量,而该指标是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从供求两方面进行了考察,这在后文中会有更详细的解释。本部分主要从市民化的界定、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内研究现状、市民化(城